

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的机理

——《巨人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评介

马相伯

内容提要：《巨人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一书批驳了关于大国兴衰的经典理论，认为霸权稳定论和国内失灵论过于悲观，权力转移期并不必然伴随着国际格局的不稳定，并提出衰落大国能够谨慎地应对不确定性，采取与实力下降相适应的收缩战略。本书具体论述了衰落程度和收缩战略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与经典理论迥异的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国家战略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预判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战略 大国兴衰 战略收缩 中美关系

“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是年轻的国际关系学科承袭自历史学的古老信条。千百年来，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大国兴衰的研究中，汲汲以求战争与和平的秘钥。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展，地球日益变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1833年，德意志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发表了《诸大国》，第一次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考察大国的冲突，从而开启了这一史学流派的先河。到了20世纪晚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更成为这一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些聚焦大国兴衰的经典著作几乎都将大国命运的沉浮与大规模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当前美国相对衰落和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甫一提出即一跃成为

马相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卡桑德拉式预言, 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 高悬于太平洋两岸渴望和平的人们头顶。

与此相较, 保罗·麦克唐纳(Paul K. MacDonald)和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M. Parent)的《巨人的黄昏: 大国的衰落与收缩》一书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¹ 这本学术著作检验了1870年以来历次大国间权力转移的案例, 认为当大国地位发生变动时, 无论是衰落方或崛起方均有积极自我调整的动力, 以期适应权力对比的新变化。在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本书提出, 衰落大国更倾向于进行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而非诉诸战争等极端手段, 并会根据衰落程度(depth of decline)选择具体的手段, 从而使本国的对外政策和核心利益相协调。因此, 权力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四伏, 反而可能由于大国能够谨慎地应对不确定性, 而降低国家之间的敌意, 进而维持宝贵的和平。基于此, 作者预期中美之间可以避免正面对抗, 且可能借助外交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争议。

本书的两位年轻作者, 韦尔斯利学院副教授麦克唐纳和圣母大学教授帕伦特, 先后于本世纪初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两位作者对于大国衰落的研究草成于2011年发表的《优雅地衰落? 出乎意料成功的大国收缩》一文, 该文回应了大国兴衰的经典理论。² 经典理论认为, 衰落大国很少主动进行战略收缩, 或因其可能会对大国地位和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或搁浅于国内政治的失灵(dysfunctional domestic dynamics)。针对这些收缩悲观论, 两位作者提出, 收缩并非铤而走险的政策, 相反, 它有可能使大国焕发新的活力。该观点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假设, 指出就大国而言, 收缩和扩张一样, 均是对国际体系的合理反馈, 从而挑战了上述两种悲观论调。这一观点首次提出便恰逢其时: 正是从2011年开始, 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连续五年放缓军费开支的增幅, 并在国防采办和海外部署等方面推动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收缩”的态势——虽然这并非明确的收缩战略。七年之后, 两位作者在本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其观点, 完善了理论框架和数据集, 增补了详尽的案例研究, 并根据当前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对未来国际格局做出进一步预判。

一、本书的逻辑与框架

《巨人的黄昏》一书包括导论和结论在内共计11章。在导论中, 作者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并概述主要观点。第一章为本书的批判基础, 讨论了经典理论中大国收缩的两类困境, 并指出其理论上的缺陷。第二章和第三章为本书的理

1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Spring 2011), pp.7-44.

论核心,作者提出了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框架,并运用统计数据进行了初步论证。其后六章为案例研究部分,依据衰落程度的不同分别考察了六个大国衰落案例的情况,并按照第三章中的研究设计,深入分析了每个衰落大国的应对措施及内在机理,对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进行了详尽论证。结论部分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本研究对当下中美关系的重要含义。现从问题起源、理论框架、案例检验和理论预测等四个方面介绍本书主要内容。

(一) 问题起源

本书的关注点取自2008年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颇为关注的重大国际政治变化:美国正处于衰落中。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定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几乎都认定美国的衰落是危险的,而这一衰落正为国际体系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

本书分别从国际体系的刺激和国内政治的掣肘两个方面概述了这些悲观论调。从前者来说,扩张和战争是应对国际体系变化最直接的“预兆”。其中,霸权稳定论者认为,衰落大国面对的是“战争抑或死亡”的困境,唯有发动预防性战争才能避免失势;而权力转移论者则强调调崛起大国使用武力的动机,认为崛起国家难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状,唯有以武力一搏。从后者来说,“国内政治失灵论”(theories of domestic dysfunction)认为,相对权力变化给予衰落大国的收缩信号会被国内政治所阻滞,官僚体系等既得利益集团会对采取收缩战略所必须的国内改革横加阻挠,从而导致战略收缩的滞后甚至失败。

在本书看来,上述论调均经不起推敲。霸权稳定论等看似是强调“成本收益”的理性考量,但战争却是靡费颇巨、风险很高的选择,且该种理论也低估了国际体系中各方协调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该种理论迷信国际责任承诺,却不过问其来源及实际价值——现实政治中,衰落大国的实力本就难以维持其原有信誉,而且责任承诺的多面性和条件性也超过了该类理论所假设的程度。国内政治失灵论尽管有其道理,但既得利益集团的组织化并不高,其分散性往往阻碍其形成持续的政治影响力,而且该种理论也选择性地无视了国际体系对国内各集团所施加的直接影响。

在批判上述悲观论调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衰落大国的战略收缩理论,详尽论述了衰落大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政治机理。

(二) 理论框架

本书认为,衰落大国的困境在于,其竞争对手日渐强大、威胁性持续上升,而已方可调用资源持续减少。在此情况下,采取收缩战略可以使该国的战略抱负和不断缩水的对外政策手段保持一致,并为改革和可能的复兴带来空间;收缩战

略的内在逻辑在于,保持战略偿付能力,避免“李普曼鸿沟”的扩大。¹

从根本上来说,收缩战略取决于大国的衰落程度。如前文所述,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美国衰落的具体认定各不相同。针对这一现象,两位作者提出了具体的量化定义:“大国位次”由其在大国GDP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当大国的国际位次下降达五年以上时,将被视为“衰落”;“衰落程度”则由大国位次下降后五年内其GDP占大国GDP总量比重的下降值来衡量,下降低于2%为轻度衰落,2%—4%为中度衰落,4%以上为高度衰落。

收缩战略受到大国所处国际结构环境(structural conditions)的影响。作者总结了四个指标以衡量国际结构环境,分别为:(1)相对位次:霸权国家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由于实力强大的刻板印象,弱化自身收缩的警觉性,在危机面前,更倾向于掩饰衰落并延缓实施收缩战略;而位次较低的国家则对权力转移更敏感,更倾向于进行积极收缩。(2)盟友能力:当盟友足以分担维持现状的国际责任时,霸权国可能会更积极地进行战略收缩。(3)责任承诺的独立性:当大国在全球各地区的责任承诺相互独立时,在单个地区的撤出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的承诺,收缩更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之,出于对“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恐惧,衰落大国则会拒绝收缩。(4)对于遭受侵略所抱有的担忧:当大国做出本土遭到军事入侵可能性较小,或国防力量有保障的预判时,战略收缩更有条件施行。

收缩战略的具体措施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种形式。战略收缩一般从国内开始,其措施包括压降军费、调整兵力结构、改革机构、分配生产性投资;国际层面措施目的在于防止国内改革受到过多外部影响,包括重新部署海外力量、消除热点地区不稳定性、重新分配国际责任、加强重点地区防御。相比而言,国内层面措施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牵扯,而国际层面措施不但要依赖外部因素,还可能涉及若干重要利益的取舍。因此,考虑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和自助属性,衰落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战略收缩的具体形式:衰落程度较低的大国更倾向于推行国内层面的措施,而衰落程度高的大国则会选择同时实行国内外两种形式的措施。

最后,本书的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可以简化为如下因果关系:“大国的衰落程度”(自变量)决定其选择的“具体的收缩形式”(因变量);“国际结构环境因素”(干预变量)则催化或延缓该因果关系的成立过程。作者根据量化定义,选取了9个大国的16个衰落案例,对其中年度军费开支、年度军队人数、年均新同盟数量、年均参与争端数量、年均挑起争端的数量和平均争端敌对性等6项量化指标进行了初步的统计检验,其统计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总体而言支持

1 “李普曼鸿沟”(Lippmann gap)是指: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来说,战略抱负过大,使得战略目标难以达成。该现象由沃尔特·李普曼提出,见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3, pp. 7-8。转引自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p. 206。

该理论成立。¹

(三) 案例检验

在提出理论框架和初步的统计检验之后,本书对大国衰落的6个具体案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1872年英国和1908年英国案例提供了纵向对比检验,1888年俄国和1893年法国案例、1903年俄国和1925年法国案例则提供了横向和纵向对比检验,以最大限度排除地缘政治和国内制度等其他可能的变量对收缩理论因果关系的影响。

1872年和1908年英国两次遭遇轻度衰落,均采取了收缩战略以因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前一个案例中,英国还通过战略收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活力。不同之处在于,较之其实力如日中天的19世纪70年代,20世纪10年代的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次变低,各大国实力的增长则提供了更多的潜在盟友选项。而随着帝国的收缩,遥远的殖民地政策不再被认为可能冲击帝国其他部分的利益,岛国地理因素又弱化了对国土安全的担忧。因此,在上述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10年代英国的收缩战略无论是具体形式还是执行力度均超过其19世纪70年代版本。此外,本组对比研究还得出一个重要发现,英国两党在对衰落的了解程度和对收缩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而其推行的具体政策也鲜有实质上的差异,这一事实对“国内政治失灵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1888年俄国和1893年法国同样面临中度衰落,其战略收缩也同样从国内层面开始,继而延伸到国际层面。不同的是,俄国的国际政策硕果颇丰、国内政策却道阻且长,而法国则正好相反。作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造成的,但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收缩的效果。相对而言,高度衰落的1903年俄国和1925年法国两个案例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收缩理论的反面论据:虽然衰落大国在两个案例中均采用了收缩战略,但其政策实施及效果均不及战略收缩理论所预测的程度。1903年的俄国拒绝在国内进行深入和持续性的改革,而1925年的法国则无力构筑足够强大的同盟,从而重新分配国际承诺责任以应对德国的再度崛起,最终两国都因此遭到了重大失败。由此说明,对于衰落程度和收缩战略之间的差异,高度衰落的容忍度最小,这种危险性和复杂性使高度衰落的大国必须谨慎应对。

1 9个大国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奥匈帝国、美国和中国,该名单系根据战争相关因素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国家体系成员名单(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 v2008.1)选定,并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监测世界经济:1820—1992》(*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中记载的国家GDP数据调整。转引自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pp.45-46。

(四) 理论预测

基于以上对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的构建和案例研究,本书的结论部分对美国对外政策和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做出了预测:未来10年中,美国会发生轻度衰落,而中国将超越美国。两位作者指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诸多调整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政策总体而言倾向于收缩战略,且以国内改革如放缓军费开支增长、改变兵力结构等形式为主。本书出版之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尚未呈现出明朗趋势,但两位作者仍然预判,除非相对权力变化的趋势有所改变,该届政府会延续收缩战略,并且会继续以国内政策调整为主要形式,在国际上则会谨慎减少对外承诺负担,但不会选择孤立主义。因而本书认为,中美两国在未来可以避免直接对抗,并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争议问题。

二、本书的特色与贡献

本书从大战略视角出发,采用一种连结历史、理论与现实政策的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熟练地运用比较案例研究和定量统计方法,增加了理论的科学性,也使得其政策意义更具有说服力。

(一) 视角与传统

大战略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战略,意指“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关注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部分与整体如何相联系”。¹ 本书承袭了国际安全中大战略研究的学术传统,关注1870年以来历次国际体系中相对权力的变化,使用一种结构性的比较,将每个大国衰落及其应对措施案例中的某种共性部分拿出来加以分析,试图在国家衰落和收缩战略之间构建一种经得起检验的因果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既富有深厚历史感,又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大战略理论,并能够面向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讨论可能的政策手段。

从本书的结构和具体内容来看,作者选择了大国衰落的16个历史案例,对其所提出的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进行统计检验,并重点展开了其中6个案例做系统比较。虽然使用的文献多为二手英文材料,但本书在概括性和全面性之间取得了平衡。其研究设计框架清晰、结构严谨,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的预判和政策建议也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在大战略视角下,该书提出大国衰落过程中的

1 [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大战略研究(课程提纲)》(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yllabus: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项目, 2013年春季/秋季, <https://is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GS%20Syllabus%203-25-13%20version.pdf>, 2020-06-14。

战略收缩理论,弥补了以往研究中衰落国家“过度扩张”解释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兴衰的大战略理论。

(二) 中性与量化

较以往研究,本书所构建的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使“收缩”成为一个完全中性化的概念,从而使其理论进一步摆脱了传统人文学科固有的规范属性。在涉及国家战略收缩时,以往研究的首要标准是区分“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这就使研究预先带入了价值判断。本书则立足于比较不同大国衰落过程中所采取的内外政策,关注收缩战略的具体形式及其体现的收缩程度,目的在于解释为何衰落大国以某种可预见方式行事。这种描述性研究的优势在于“回避了后见之明的偏见,为异常案例提供了测量其偏离度的标准”。¹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其所采用的量化方法上。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衰落程度”等理论变量和军费开支等政策指标都做了具体的量化,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构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概念做量化时尽力保持谨慎性:以上文所述的“衰落程度”(自变量)为例,仅就该概念,本书提供了三个相关的量化定义,不但使理论的核心概念更加精确严谨,更使其具备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同时,作者也对使用量化数据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说明,提醒读者注意量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有所偏离。

(三) 现实政策意义

本书构建的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及其论证过程中所提出的观点,对当下国际关系局势和未来世界主要大国对外政策选择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那些被“世界政治中的转折与变革必然带来战争和动荡”这一充满宿命论的命题所困扰的人们来说,本书不啻为一剂良好的降压药。过去的决策者在面临国家衰落时,多有收束力量,稳掌国家之舵,避开了历史长河中诸多暗礁与漩涡的案例。当代大国领导人拥有更稳固的航船、更精准的仪器和更适宜的天气,毫无疑问也更有可能选择适当的收缩战略,以应对权力转移期的不确定性。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应考虑到美国可能的战略收缩需求,谨慎地制定对美政策,避免无谓的摩擦和争端。

此外,本书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政策参考价值的观点。如作者在分析两次英国衰落案例时指出,由于大国实力的变化,衰落大国更有可能在衰落期找到能够分担责任的盟友,崛起者未必是敌人。这也提醒我们应关注权力转移期各大国之间

该书提出大国衰落过程中的战略收缩理论,弥补了以往研究中衰落国家“过度扩张”解释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兴衰的大战略理论。

¹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p. 50.

的共同利益,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本书的不足

虽然本书以理论、历史和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仍存在不足。

首先,作者在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二重的因果关系:衰落大国倾向于进行战略收缩;收缩战略的具体形式取决于衰落程度。但在本书的实际论证过程中,特别是案例分析当中,作者却把重点放在了后者,未能展开两个连贯的因果分析。读者在阅毕本书之后,会对衰落程度和收缩战略之间的因果关系有较为明确的认知,但“衰落大国为何会选择收缩战略”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具体的国际政治现实环境中进行论证的问题。即使本书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收缩战略的理论,也应当首先明确,衰落大国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收缩而不是预防性战争等其他相反的战略选项;在此基础上,再详细考察收缩战略的具体形式,而不是直接假设所有衰落大国都会选择收缩战略。实际上,本书提供的16个衰落案例中就包含了两个异常案例:在1946年英国案例和1987年苏联案例中,两国在衰落时均表现出了高度的好战性,虽然作者指出这两个案例中并未发生预防性战争,但至少说明衰落大国的好战倾向不可忽视。在何种情况下衰落大国的好战倾向压制了战略收缩的可能性,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其次,本书所选择的16个案例中,仅有三个案例发生在二战之后,而作者进行详细论证的6个案例甚至全部发生在二战之前。这种时间上的不平衡性限制了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的成立范围,也使其现实政策意义的重要性有所减损。例如,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衰落大国战略收缩理论中所包含的干预变量的四个指标皆呈现出迥异于战前的面貌。

(1)大国的相对位次的变化。二战之后,美苏两国在大国GDP总量中占据绝对优势,大国的数量变少了,其“质量”方差则变大了。后冷战时期,尤其是近年来,美国虽然面临着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但其生产能力与其他大国相比仍然处于遥遥领先地位,而本书所预测的“超越者”中国虽然仍处于快速崛起过程中,但也面临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所带来的严酷考验,现有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因而在未来10年内,美国未必会出现本书所定义的“衰落”。

(2)盟友可靠性的变化。大国“质量”方差的拉大可能导致盟友分担责任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美国在北约和印太的同盟体系中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与盟友关于防务承担和开支分担方面的谈判进展不大,长期依赖美国获得地区平衡的盟友目前仍未表现出明确的国际责任分担能力。

(3)国际责任承诺的独立性的变化。对“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恐惧似乎一直

是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梦魇。不过，考虑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极力争取从中东撤出，对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来说，其在全球各区域之间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承诺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成立。这可能是四个干预变量中唯一一个变化较小的指标。

(4) 遭受侵略可能性的变化。核时代的降临和远程导弹技术的发展可能已经颠覆性地改变了衰落大国对于遭受侵略的考虑。虽然本书认为核威慑的存在减少了衰落大国对遭受侵略的担忧，但对于衰落大国来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为残酷。此外，核武器的“安全饱和”状态也会使决策者更有可能倾向于冒险。当然，收缩未必意味着国土安全防卫能力的降低，但至少会要求衰落大国更加精确地协调和执行收缩战略的具体措施。对于衰落大国进行适度战略收缩而言，核武器带来的生存担忧同样是一个阻碍。

总之，上述四项国际结构环境指标是否仍然能够在现有理论框架中发挥相同作用，或大大降低现有理论的成立可能性，仍需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本书为大国兴衰理论提供了一种与经典理论迥异的视角，这使得人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未来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如果说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学界思维定式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这一古老信条，那么现在是时候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也是由美国拒绝收缩及其引起的中国的恐惧所导致的。”¹

1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p. 50.